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第二辑)

张懋镕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第二辑)

张懋镕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共收入 30 篇学术论文，主要是作者近四年来的新作。作为《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的续集，其内容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书中既有关于新出青铜器意义价值的探讨，也有结合传世青铜器，从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作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在铭文方面，除了考释字词，更多地结合历史来探讨文字的起源、结构特点以及对铜器断代的意义。

本书可供古文字、青铜器、商周史的研究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张懋镕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3-018317-7

I. 古… II. 张… III. ①汉字: 古文字-文集②青铜器(考古)-中国-文集
IV. H121-53 K876.4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0580 号

责任编辑: 海 宁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安春生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12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2 插页: 1

印数: 1—1 200 字数: 424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2003年1月28日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考察新出土的眉县窖藏青铜器（王保平摄）



2003年10月14日在奥地利赴萨尔茨堡旅行途中



1985年6月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与导师
李学勤教授合影于西北大学校园



1996年春在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考察青铜器
(弓场纪知摄)



2006年5月22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所内提供）

序

张懋镕教授多年执教于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著述甚丰，在学术界富有影响。2002年我曾为他的《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写序，现在一部新的论文集又将出版，内容更加充实深入，使我感到应该在这里再说几句话。

前些天我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到，中国古文字学这门学科目前正面临十分难得的大好机会，这样的良机，历史上少有，将来也未必重见。近年大家常常征引的一篇名文，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夏天在清华讲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原因是这篇文章中指出学问的进步多由于新的发现。王国维那时谈的四大发现，关系到古文字的就是殷墟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以前，虽然从宋朝以来著录的青铜器上就有商代的文字，但只是在甲骨文得到认识之后，系统研究商代文字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样，就在古文字的发展序列中，补上了前所未知的一大段。

事实上，文字之学在中国起源甚早，《说文》是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一直到晚清，文字学的领域都没有逾越《说文》一脉的范围。比如说吴大澂，他对金文、陶文、玺印等等都有研究，然而他的书还是叫《说文古籀补》，以为《说文》添砖加瓦为职志。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学者进一步认知了《说文》的时代局限，打破了原有的思维束缚，于是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工作迅速开展，又有种种新的重大发现。其间最突出的，是时代属于战国到汉初的简牍帛书，特别是其中有许多久已亡佚的典籍。过去人们艳称的孔壁中经、汲冢竹书，后人无法直接见到，近年的这些佚籍比之并无逊色，实在是我们的眼福。大家以往能见的战国至汉初文字，数量

很少而且零碎，所以这些简帛正和上述甲骨文的情形一样，把原本在文字发展序列中欠缺的一大段补足了。

出土简帛的珍贵新颖，理所当然地吸引着古文字学者的关注。每一批新材料的著录公布，都带来一波讨论研究的热潮，有讲读班、研讨会，论作广及互联网、报刊和专书。这充分表明，古文字学在蓬勃发展，早已不是二三十年前大家为之担忧的那种“绝学”了。

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状况也是一样。近年国内各地新出现和发表的这方面材料，真是层出不穷。2006年4月出版的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所收《殷周金文集成》以外的青铜器，便有2005件之多。张懋镕、张仲立编著的《青铜器论文索引（1983~2001）》，也有厚厚的三大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有考古出土记录的材料空前增多，大大推进了青铜器分期、分域工作的进展。

我认为，当前我们不仅要大量新见材料作出分析考释，还必须回过头去做好一些基础性的整理研究，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或许更必要、更紧迫的。缺少这样的工作，对新材料的考察就只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而新材料所能起到的效用也将大受限制。

张懋镕教授正是十分重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的。我们看他这部新的论文集，在论析若干最新出现的器物，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外，更多的论文是讨论青铜器和金文的基础性问题，例如所谓“族徽”文字的性质，青铜器器类的辨析，地方青铜器的特点，器物的分期与年代等等，都有很关键的学术意义。他的各篇论文，都富于新意，有启发性，也是读者翻阅之下便能发现的，用不着我在这篇小序中介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会看到他更丰硕的成果。

李学勤

2006年12月18日于清华园

目 录

序 李学勤 (i)

壹 古文字考释

-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浅见 (3)
-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 (7)
- “夷伯尸于西宫”解 (19)
- 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 (22)
- 金文字形书体与 20 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 (30)

贰 新出青铜器研究

- 卜淦口高戈考论 (37)
- 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研究二题 (41)
- 眉县窖藏青铜器与西周单逯家族 (44)
- 陕西延川新出商代青铜器考论 (51)
- 西安市文物库房所藏青铜器撷英 (57)
- 上海博物馆藏金读记 (65)
- “鲁侯熙铜器”献疑 (69)
- 鬲侯鼎小议 (73)
- 礼县圆顶山秦墓铜器琐谈 (75)

叁 青铜器综合研究

- 两周青铜盥研究 (85)
- 商周青铜角探研 (114)
- 青铜盆小议 (128)
- 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 (133)
- 试论宝鸡強国青铜器的特点 (142)
- 西周周王铜器论列 (151)
- 关于中国青铜器大型图录书的订正意见 (159)

肆 西周铜器断代研究

| | |
|-----------------------|-------|
| 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 | (177) |
| 宰兽簋王年试说 | (204) |
| 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 (209) |
| 幽王铜器新探 | (235) |
| 逯盘与西周王年 | (241) |

伍 其 他

| | |
|--------------------------|-------|
| 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吴国工匠制作说质疑 | (247) |
| 关于周公庙墓地性质的另类思考 | (273) |
| 略说对周昭王南征的评价 | (276) |
| 先秦礼玉与礼玉系统管见 | (280) |
| 后记 | (286) |

壹 古文字考释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浅见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文明的形成、国家产生的时间与条件，而且涉及“谁创造了文字”（由此又涉及“谁创造了历史”）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

20世纪以前，关于这方面的论著不计其数，解说也极纷繁，但多基于早期文献记载，陈陈相因。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史前刻绘符号的出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和新思路。不过，由于传统理论的巨大影响，历史研究往往难以摆脱政治利益的羁绊，在对新资料的解释上囿于成说，不敢突破。本文想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就教于专家们，权作抛砖之举。

一

中国文字的产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所谓“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作了文学上的夸张，但对人类社会的震撼力是不容置疑的。出于政治的需要，封建史学家、文字学家主张文字是由某位圣人创造的，相当普遍的说法就是“仓颉造字说”（见《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即主张文字是在较短的时期内突然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文字“突变说”。

到了20世纪，“突变说”遇到挑战。学者们根据大量史前刻绘符号的发现，指出中国文字的产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甲骨上已经出现了刻画符号。而后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姜寨遗址，而后的龙山文化丁公村遗址，以及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出现刻绘符号，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6800~前2000年，历经4000多年。对于这些刻绘符号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视其为“早期文字”^[1]，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视其为“早期文字”，但可视为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2]。但不管分歧如何，至少都认为这些史前陶器刻绘符号与后来的文字有关系。多数学者指出它们是中国文字的前身。从这一点出发，50年来的文字学论著多主张中国文字的产生过程是“渐变”式。由于“突变论”势必和“圣人造字说”相挂钩，陷入所谓“唯心主义”的泥沼，遭人唾骂，因此在半个世纪中无人再敢谈论^[3]。于是中国文字“渐变说”占了统治地位。

然而仔细琢磨，“渐变说”也存在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

（1）一些学者在分析了史前陶符后指出：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内部不能产生文字；

陶符不能表达语言；陶符孤立存在，停滞不前^[4]。既然如此，这种“不变”或“渐变”（暂且我们认为有一种极缓慢的变化）怎么会对中国文字的形成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呢？

（2）迄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文字的前身是大汶口文化陶缸上的符号和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多个陶符。前者时间在公元前3000~前2600年，后者在公元前3300~前2200年，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如此看来，文字的产生大约在步入文明社会的前夜，形成过程似乎并不那么漫长。

在这里，首先要分清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文字起源”，一个是“文字形成”。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可分为两个阶段：①第一阶段：即中国文字的起源阶段，大约是从公元前7000~前2500年左右。其基本特点是：a. 变化过程长，变化幅度小；b. 刻符以单个形式出现，未形成句子；c. 这些刻绘符号的形态确与后来的文字相关，不能将其排斥在我们的讨论之外。②第二阶段：即中国文字的形成阶段，大约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左右。基本特征是：a. 持续时间较短，变化幅度大；b. 出现成句的陶符。

第一阶段可称之为文字的“渐变阶段”，第二阶段可称之为文字的“突变阶段”。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必须经过这么两个阶段。理由如下：

首先，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即“渐变”）到质变（即“突变”），这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例如在生物界，“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理论日益为新发现的大量生物化石所印证，生命演化的渐变理论受到挑战。“突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形成的模式时，固然需要参照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情况，但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文字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可能要比国外漫长。原因是：①中国幅员辽阔，即使文字在某一地区形成，如果它没有更广阔的地区（主要指中原地区）占有主导地位，它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系统。比如丁公陶符，即使是文字，由于它与后来的商代文字存在较大距离，也不能被看作中国文字形成的标志之一。②商代文字很可能是由某一地区的史前刻绘符号发展起来的，从区域性文字到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文字系统，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③我们暂且把这一过程叫做文字的扩张过程。在扩张中，政治局面的逐步统一是不可缺少的。而战争是统一的良方。通常所说的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形成，其中也包括文字，依靠战争的巨大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向四方扩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突变”。④在文字突变阶段，除了战争，经济的发达、城乡的分野、国家的出现等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文明形成的标志时，总是把上述因素作以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中国文字的形成存在一个“突变期”，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自传说中的黄帝时开始到夏代前期。或许有人会问：这么长一段时间怎么称之为“突变期”呢？相对于四五千年的“起源期”（即渐变期），不到一千年的“形成期”（突变期）可算是短暂了。

二

当上述问题基本廓清后，所谓“谁创造了文字”也便有了答案。

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受到彻底批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到全面宣扬。表现在“文字起源与形成”问题上，自然主张文字是由劳动群众创造的。“劳动人民创造说”是建国以来一些文字学著作中流行的说法^[5]。尤其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时代，“圣人造字说”名誉扫地，臭不可闻，谁也不敢对它作客观评价。

在政治上，彻底否定对方，也许是很必要的。然而在学术研究上，简单地否定一个命题、一个理论，不仅是危险的做法，也是浅薄的表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认真地分析一下文字起源与形成的全过程。

如前所言，在漫长的文字起源阶段，即我国的新石器时代（不包括末期），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地位平等，尚未出现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现象，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劳动者，因此当时不存在后世所说的“劳动群众”、“人民群众”的含义，因为这些名词是作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这一时期，陶器上刻绘符号的发明者是众多的氏族成员，是全社会的共同创造。到了这个阶段的末期，贫富分化现象出现并开始加剧，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青海柳湾墓地，刻绘符号只出现在级别高的墓主人的陶器上。表明刻符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刻绘符号的发明者。以前将陶器制作者（制陶者）与陶符发明者归为同一人（或同批人），这个观点实际上缺乏足够证据，需要重新研究。到了文字形成期，即将或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贫富分化明显，阶级对立鲜明，随着社会分工更细，从事搜集、整理、统一文字的工作很自然为统治阶级（包括巫师、卜人乃至王）所包揽，这一点，很多学者已注意到^[6]。显然，此时创制文字的主体已由氏族成员转向奴隶主阶级。尽管文字的整合工作是否由某些圣人来做，没有确实证据，但当时一定有这么一批文化人。有些人抓住“仓颉”此人无法证明这一点来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其实古人比我们要实事求是得多，如《荀子·解蔽篇》就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又说：“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一也。”荀子也没有说文字是仓颉一人所造，但总有一批人作整合工作。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字形成阶段，某些重要人物对文字的确立、宣传、传承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人物自然是当时统治阶级中人，而不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劳动群众。

总而言之，把文字的发明归结为历史上的圣人、少数英雄人物的行为，固然是一种偏见，而将他们的作用一笔抹杀，或者降低他们的作用，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客观地说，文字的起源与形成是全体人的创造，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附带说明一点，把历史（这里指广义的历史，包括史前史）的创造者说成“帝王将相”是一种偏颇，说只有人

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同样是一种偏颇。

最后需要说明，由于殷商甲骨文以前的文字或刻符资料发现的数量还很少，难以将文字起源与形成过程具体描述出来，所以上述不少结论仍属于推测。

注 释

- [1]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 [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第18页，中华书局，1985年。
- [3]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1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 [4]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 [5] 丁易：《中国的文字》，三联书店，1951年。
- [6]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原载《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


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研究，向称繁难。原因之一是它在青铜器上的表现形式极为特殊，往往单独出现，即便与其他铭文一同出现，也游离于文句之外，其词性与含义均难推定。这一点我们已经做过论述^[1]。原因之二是族徽文字形体结构的不稳定性，导致一字多形，异构复杂。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使族徽文字考释的难度非常大。关于一般古文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古文字学界已有很精深的研究，而于族徽文字，尚未见有专论。本文拟在这一方面作初步探讨，希望对解读族徽文字有所帮助。


一、研究方法

要讨论族徽文字的形体结构特点，首先需要了解每一个族徽文字有多少种异构，或者说哪些异构是某一个族徽文字的不同写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可靠的研究途径和判断方法。我们认为大致有如下几种方法：


（一）器、盖铭文对照法


某些青铜器类，如卣、壶、觶、簋等，既有器身，又有器盖，如果器与盖上都有族徽文字，则往往相同，这就是所谓同铭现象。个别甗的甗上与鬲上也铸有相同的族徽文字。当然也有器与盖不是原配的，铭文不相同，但那毕竟是少数。器与盖的族徽文字相同，但形体结构上并不完全一致，这便给我们提供了一字多形的极好的资料。如：

例1  保子达簋器铭(《三代》7.28.2)


 保子达簋盖铭(《三代》7.28.1)


文字笔画极简单，但二者书写走向仍有差别，若无证据，也不能将二者视为同一族徽。

例2  作彝卣器铭(《三代》12.57.6)

 作彝卣盖铭(《三代》12.57.5)

较之例1，二者形体差别更大些，前者两手有所动作，但对象不明，后者右手似在扶着头上顶戴的物件，若不是出现在同一件卣上，很难设想它们之间有何关系。

例3  妇庚卣器铭(《三代》12.57.8)

 妇庚卣盖铭(《三代》12.57.7)

前者象形，后者抽象，只是结构上依稀相似，若不在一器上，也无从判定为同一族徽。

例4 父丁卣器铭(《三代》13.28.3)

父丁卣盖铭(《三代》13.28.2)

前者隶定为亚泚，后者隶定为亚止，少了偏旁三点水，结构上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例5 史见卣器铭(《三代》13.23.1)

史见卣盖铭(《三代》13.23.2)

后者写法常见，而前者则少见，据此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史字的其他异构。例如2002年陕西延川县马家河乡华家塬出土一件青铜壶，上有铭文3字，首字写法与史见卣器铭“史”字形体相近，可释为“史”字^[2]。第3字“𠄎”，或释作鬼字，因此壶出土地点离清涧李家崖遗址近，后者或被指认为鬼方遗存，此壶似与鬼方有关。但“史”字的确认说明此器乃“史”族之器，而最早的史族铜器见于山东滕州、河南安阳等地，时在商代晚期，所以史族的老家可能在豫西或者鲁东，与地处陕东北的鬼方相去甚远^[3]。𠄎可能是私名，而史则无疑是族名。

总之，利用盖器同铭的特点，去认识和考证族徽文字，是一个可靠的办法。

（二）同人之器比较法

有两件或两件以上的青铜器，铭文显示作器者名字相同，铭末又缀有相同的族徽，那么它们显然是属于同族同人之器，尽管族徽文字的写法不同，甚至差异较大，也应为同一族徽无疑。如一件叔侯父簋的族徽为“𠄎”（《三代》7.32.6），另一件叔侯父簋的族徽为“𠄎”，“𠄎”与“𠄎”为同一族徽的不同写法。夺作父丁卣(《集成》^[4]5330)、夺作父丁鼎(《集成》2366)、夺作父丁尊(《集成》5921)、夺作父丁壶(《集成》9592)上的族徽文字分别为𠄎、𠄎、𠄎、𠄎，形体各不相同，尤其是第3例与人字无别，若不是出在同人之器上，根本无从推想。再如见册鼎(《集成》1762)与见册铙(《集成》400)上族徽文字分别为、，可知二者为齿字的不同写法。

（三）同族之器比较法

凡是同族之器，其上所缀族徽文字尽管不尽相同，但相似性还是大于差异性。同理，通过对一大批形体结构十分相近的族徽文字进行分析，可以归结为同一族徽的不同异构。例如亚重觶(《集成》6162)、重父丙觶(《集成》6249)，重父癸觶(《集成》6325)、重父丙爵(《集成》8438)、重父辛鼎(《集成》1885)、倝父丙鬲(《集成》478)、癸重觚(《集成》6840)、重爵(《集成》7367)、重鼎(《集成》1004)等器的族